

第一章 对中国国际地位的认识和评价

冷战结束后国际格局的变更和各种国际力量的分化组合给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机遇与挑战。一方面，受国内政治风波、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和西方国家制裁等国内外因素的影响，中国的国际地位受到了重大的冲击。西方媒体和学者普遍认为中国会像苏联那样很快出现问题、政局动荡进而根本改变政治制度。另一方面，随着冷战后国际形势的进一步变化和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国际地位不断上升。在这种情况下，国际社会产生了“中国崛起论”、“中国威胁论”和“遏制中国论”等论调。

第一节 冷战后初期关于中国 国际地位的理论观点

冷战后初期，由于苏联的解体和国际格局的变更，冷战时期形成的各种战略力量面临重新分化组合，但各大力量发展变化的趋势尚不明朗。在这种形势下，关于中国国际地位的流行观点一度以悲观和怀疑占上风，甚至认为相对于冷战时期中国的国际地位不仅没有提高，反而降低了。这类观点又大致分为“战略地位下降论”、“历史终结论”和“发展困境论”等几种。

一、战略地位下降论

冷战时期，特别是 20 世纪 70 年代后由于中美苏大三角的

存在，美国在对外战略上需要联合中国对抗苏联，因此中国在美国对外战略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然而，随着冷战的结束和苏联的解体，中美苏大三角关系不复存在，这种变化给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受国内政治风波、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和西方国家制裁等国内外因素的影响，与冷战时期相比，中国的国际地位受到了重大的冲击，一度引起许多人的怀疑和贬低。

众所周知，中美两国作为两大阵营的主要力量，在冷战形成的初期曾经严重对立，甚至在战场上兵戎相见，生死较量。但 20 世纪 60 年代后由于中苏关系的破裂和对抗，中美两国出于对抗共同对手苏联的战略考虑，自 20 世纪 70 年代初开始恢复接触，并且互视对方为重要的战略同盟伙伴。中美苏大三角开始形成，美国利用“中国牌”牵制苏联，中国也可以利用美苏矛盾，联美反苏。因此，中国处于一种相对有利的国际地位。基辛格在 1971 年 10 月致尼克松总统的一份备忘录中明确指出：“我们想利用中国政策告诉莫斯科，它并不能代表所有的共产主义国家，……他们不得不考虑可能出现的美中合作——所有这些将不至于引起苏联的过分偏执。对苏联的有力影响恐怕正是我们从中国的主动中所获得的最大收益。”^① 保罗·肯尼迪认为，“中国在当前（和将来）国际体系中作为真正独立的角色的重要性，由于它在处理与其他大国的关系时所表现出的‘风格’而大大增强了。”^② 乔纳森·波拉克也认为：“中国在国际上享有独特的地位，它不但

参见 [美] 亨利·基辛格：《白宫岁月——基辛格回忆录》第三册，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44 页。

^② 参见 [美] 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求实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557 页。

是冷战后许多重要的政治和军事冲突的参加者，而且是一个不为随便形成的政治或意识形态组织所动的国家……其实，凭中国的分量，它在一定意义上应被看作候补超级大国，……从长远来看，中国代表着一种政治和战略势力，它是如此重要，以至于既不能把它简单地看作是莫斯科或者华盛顿的附属物，也不能把它看作一种中间力量。’^①

然而，冷战的结束似乎改变了这一对中国有利的国际环境。冷战的结束是以苏联的崩溃和解体为主要标志的。苏联解体之后，其超级大国的地位已经丧失，美国成为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中美两国共同的战略对手随之消失，美国再也不需要利用“中国牌”来制约苏联这个对手了，中美之间共同的战略利益也大大削弱。美国的一些政治家认为中国对美国在冷战时期的全球战略作用已消失，美国在谋求世界领导地位时无需再利用中国制衡其他大国。因此中国在美国对外战略中的地位已经大大降低了。美国众议院亚太小组委员会顾问理查德·布什博士认为：“从我们的利益来看，美国的政治在地缘政治和价值上，我们已经赢得了冷战的胜利，所以在选择伙伴时也更有发言权。”^②这种胜利狂欢般的欣喜之情是冷战后西方政治家的普遍心理。在评析这一现象时，美国著名学者哈里·哈丁博士指出：“在美国政治上的多数人仍然认为中国没有过去那么重要，那么令人赞赏，那么愿意合作，随着苏美关系的改善，随着冷战的结束，中国失去

参见 [美] 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第 557—558 页。

参见席来旺：《举世关注的中美关系》，湖南文艺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0

了它原先抗衡苏联扩张主义的有利地位。’^①相比之下，统一后的德国和号称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的日本在冷战后初期受到更多的关注。

苏联的解体使中国的国际地位受到削弱，“中国牌”的作用已经降低甚至消失，这是不争的现实。冷战期间中美关系的战略合作主要源于共同对抗苏联，但两国关系发展的基础并不仅仅是为了对付苏联。自 20 世纪 70 年代中美恢复和发展双边关系之后，两国在共同维护亚太地区的稳定、防止核扩散、共同维持联合国的正常运转、增进中美双方的经贸利益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发展。在冷战结束之前，中美关系已经具有了多方面的合作基础。正因为如此，中国方面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实施对外战略的重大调整，宣布不与任何大国结盟，也不与任何大国结成战略同盟关系。1989 年中苏关系正常化之后，中美关系并没有因此而停滞。冷战结束削弱了中美关系共同对付苏联的一面，但并不意味着彼此战略利益的完全终结。甚至在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等问题上，双方合作的基础还得到了加强。正如美国前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阿诺德·坎特指出的：冷战后，美中之间的战略关系至少与冷战时期同等重要，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超过了冷战时期。^②

“战略地位下降论”的立论依据是从冷战时期中国在美国对外战略中的重要性角度来评估中国的战略地位，甚至仅仅是从美国人在对外战略中考虑制约对手时伙伴作用的片面角度来评价冷战后中国在全球世界的国际地位这样一个综合性问题，因而这一

参见 [美] 哈里·哈丁：《美中关系的现状与前景》 新华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73 页。

^② 参见阿诺德·坎特：在中国人民大学的演讲，1993 年 5 月 19 日。

观点不是全面分析一国国际地位的理论。事实上,即使是按照这一观点,冷战时期中国的战略地位再重要,也仅仅是由于作为美国的伙伴,由于结盟关系而显得相对重要的,并不是一支真正独立的国际主体力量。

二、历史终结论

“历史终结论”认为:指随着冷战的结束和原苏联和东欧等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经济体制的变更和终结,社会主义实践已经进入低潮。因此,社会主义中国的国际地位的下降和衰落将是不可避免的。冷战的结束是与原苏联和东欧等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经济体制的变更相联系的。苏东剧变标志着 20 世纪兴起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了低潮时期。这种国际环境对于同样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来说不能不产生重大的消极影响。在一些西方政治家和学者看来,苏联的解体和东欧的剧变标志着共产主义的彻底失败和西方自由民主的全面胜利。许多西方政治家和学者断言:“共产主义的时代已经成为历史”,^①“共产主义的极权主义在社会演进的自然有机过程中打下了休止符”。^②甚至有人预测: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中国濒临地区分裂,政治崩溃或民主革命”。^③因此,中国国际地位的下降和衰落将是合情合理的和不可避免的。

苏联东欧的剧变对中国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中国作为硕果仅存的社会主义大国,必将成为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

参见美 布热津斯基:《大失败》,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3 页。

^② 参见[美]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远方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55 页。

参见[美]哈里·哈丁:《红星在东方升起》,转引自[美]理查德·伯恩斯坦、罗斯·芒罗:《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新华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201 页。

“和平演变”战略的主要对象，必然会面对西方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等方面的更大压力。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中国实施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基本战略，西方国家的资金和技术是中国迅速发展的重要外因之一。冷战结束后，随着西方国家对华普遍制裁，中国的经济发展将会停滞，国家综合国力的提高将大大延缓。

然而，中国的国情独具特色，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与前苏东国家有着很大的区别。中国自 20 世纪 60 年代初期与苏联关系破裂之后就开始探索走自己特色的发展道路，苏联对中国的影响已经大大降低。何况中国自 1978 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战略已经收到了显著的成效。国家的体制和模式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可能重复苏联的悲剧。尼克松认为：“戈尔巴乔夫进行了 7 年改革，苏联的人均收入下降了，而邓的改革计划使中国农村收入在 6 年里增加了一倍，使中国人均收入在 10 年里增加了一倍，……这些改革如果再继续一代人的时间，中国将成为重要的经济强国。”^①实际上，苏联和东欧演变的经验教训使中国人更加坚定了改革开放的基本方针和基本路线，坚定了在改革开放的同时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决心，并且在实践中创造了邓小平理论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只要坚持这一发展道路，中国的发展将会持续，中国的国际地位必将继续提高。

“历史终结论”的依据是两大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对立和对抗，是冷战思维的继续，由于偏见而漠视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成就和社会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只是一厢情愿的主观推理，因此

参见 [美] 理查德·尼克松：《抓住时机》 新华出版社 1992 年版 第 135 页

其预言是注定要失灵的。

三、发展困境论

冷战结束后，中国的经济发展并未出现停滞的迹象，一些西方学者在承认中国发展的同时也认为，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中国的发展将会面临很多困难，中国的发展将处于严重的困境之中，很难在短期内提高本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甚至认为许多天然的困难是中国无法克服的，所以对中国的发展抱非常悲观的态度。综合起来，这些制约因素有以下几个方面。

1. 经济方面

冷战结束初期曾有许多人不看好中国经济，而 20 世纪 90 年代上半期中国经济的高增长使这种悲观的看法失去了市场，到了 90 年代中期已经没有人怀疑中国经济的总体规模高速增长了，但对中国人均收入增长的估计并不像总体经济增长那么乐观。也就是说，即使中国经济规模相当巨大，由于人均收入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所以中国的实际经济实力仍然较为落后，这制约了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和上升。世界银行 1995 年发表了按新国家财富计算方法计算的评估报告认为：中国人均财富位居世界第 162 位，与不丹和老挝为伍。^① 一些西方学者甚至认为中国人均收入要 200 年才能赶上美国。^② 中国的出口仍是以低附加值、低科技的产品为主，在世界市场上很容易会被别国替代。而中国的进口以高科技、高附加值的产品为主，其数量与日俱增，其来源难有替代，其价格也难以下跌。中国虽然已拥有世界第二大外汇储备，但大量的外汇储备来自外商投资，近期中国却出现了危险的

^① 参见阎学通：《中国崛起》，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52 页。

^② 参见 Nicholas Lardy, *China in the world economy*, Washington D.C.: the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94, p. 25

投资账户赤字。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居世界前列，但中国仍有多达 30% 的劳动力处于失业、待业或隐性失业中。^①

美国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在他 1993 年完成的《挑战世纪》一书中，为中国的发展描绘了一幅十分暗淡的图画。他认为中国与西方国家在经济水平上的巨大差距本身就决定了中国不可能赶上发达国家。中国如果能保持稳定的经济增长，也仅仅是将中国的人均收入从 300 多美元提高到墨西哥的 1825 美元的水平，最多能达到匈牙利的 2237 美元的水平就已经相当不错了。他认为中国要想把人均生活水平提高到韩国的水平是难以想象的。他估计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在短期内会有较大增长，人均生活水平绝对比现在富，但在下世纪，中国人相对于发达国家居民来讲仍是贫穷的。^② 莱斯特·瑟罗在《21 世纪的角逐》一书中指出：“尽管中国在政治上和军事上一直是重要的，但在 21 世纪的上半叶，即使它在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重新得到发展，对世界经济也不会产生重大的影响，这样说的理由是基于下述数字，中国的人均年收入未超过 300 美元。”^③

格莱尔·西格尔（Gerald Segal）认为：中国是一个对世界特别是亚洲以外地区影响较小的市场。按对全球产出的贡献来看，中国经济算不上崛起。1997 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的 3.5%，而 1900 年为 6.2%。而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世界排 81 位，即使按照 PPP 法也才排到 65 位。从中国占国际贸易比重

参见 王飞凌：《用美式逻辑与美国交往》，《环球时报》1999.08.20。

^② 参见 [美] 保罗·肯尼迪：《挑战世纪》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45—165 页。

参见 [美] 莱斯特·瑟罗：《21 世纪的角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81 页。

来看，1997 年中国仅占国际贸易的 3% 和亚洲贸易的 11% ，在美国对外出口中中国也仅占 1.8%（略低于台湾）^①

2. 自然资源

中国土地、生物、矿产、能源等自然资源和资本均相对十分贫乏，且人为的破坏和污染都极为严重。保罗·肯尼迪认为，如果把资源平均分给每个中国人，那么平均分得的土地仅及世界平均的 1/3，农地的 1/4，牧地的 1/4，林地的 1/9，水资源的 1/4。中国可耕地只有 2.5 亿英亩，却要养活 12 亿人口，相比之下美国有 4 亿英亩耕地，只有 2.3 亿人口。到 2000 年，如果进口粮食中国将要消耗大量的外汇储备。如果不想依赖进口粮食生存，中国就要对农业进行大规模的投资，兴修水利，增加化肥和农业设备的生产，培植良种，提高农业加工能力。不论是进口粮食还是增加农业投入，都将占用工业现代化的资金，减少其他部门的发展投入，影响中国经济的增长。^②此外，中国的能源和其他的资源也严重不足。世界银行在 1995 年采用新的方法计算国家的财富，这种计算方法包括了四个方面：自然资本、产出资本、人力资源和社会资本。（自然资本包括土地、水资源、木材及地下资源，即石油、黄金、铁等矿产；产出资本包括机器、工厂、基础设施、水利系统、公路、铁路等；人力资源包括人的生产能力，如教育、营养等；社会资本包括家庭和社区的组织机构。）按这种资源与资本并重的计算方法，中国人均财富中只有 8% 来

参见 Gerald Segal, "Does China Matter?",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October 1999, pp. 24—27.

参见 Gerald Segal, "Does China Matter?", pp. 24—27.

自自然资源。^①

3. 人口

分析中国崛起的困难的角度是多种多样的，较多的人是从中国人口负担的角度分析的。美国佐治亚理工大学王飞凌认为：中国人口众多，占人类 1/5 到 1/4，但亿万劳动力的教育水平和劳动生产率均低下，人力资源的管理和使用均十分落后。^②同时，人口负担将给中国带来许多方面的问题。首先是中国每年增加 1300 万人口，经济成果将被不断增长的人口所吞食。其次是独生子女政策将使中国遇到严重的人口结构不平衡问题。老年人比重过高，社会发展承受不了赡养他们的负担。第三是人口增长导致粮食不能自给，从而妨碍经济正常增长。第四是人口质量不高，妨碍现代化的发展速度。人口带来的问题将意味着中国全面赶上发达国家的可能性很小。^③

4. 教育

有人从教育角度分析，认为中国崛起困难主要源于教育水平太低。经合组织的专家认为，在未来的 20 年里，中国经济处于劳动密集型工业向技术密集型工业的过渡时期，这需要大量资金对劳动人口进行科技培训。然而中国虽然有巨大的人口资源，但是由于教育投入太少，所以人口的素质远远低于发达国家，这将成为中国现代化过程中难以克服的困难。目前中国成人识字率为 69%，这意味着文盲人口为 2.2 亿。虽然 90% 的儿童上了小学，

^① 1995 年 9 月，世界银行公布的世界 192 个国家和地区的财富排名表。参见李述一：《21 世纪中国崛起》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229 页。

^② 参见王飞凌：《用美式逻辑与美国交往》，《环球时报》1999.08.20。

^③ 参见曹凤中、马登奇：《绿色的冲击》，中国科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0—32，416—417 页。

但能接受高等教育的年轻人比例却很小。发达国家的教育开支一般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6% 左右，而中国只有 3%—4%。人口与教育结合才能使人口成为经济发展资源，没有教育，人口增加就会成为社会负担。教育低投入对现实经济发展的影响可能不明显，但它将影响长期的发展前景。在知识分子并不很多的情况下，中国的体制不能充分发挥现有知识分子的能量，估计有 1/3 的知识分子没有合适的工作。^① 今后国际竞争的焦点是技术竞争，中国劳动力的教育水平不适合现代科技产业发展的需求，所以中国要赶上发达国家，将面临长期技术滞后的困难。中国虽有相当齐全的工业体系和世界人数第一的科研人员队伍，但在代表当代工业成就的汽车、飞机、电子、生化等行业中，中国无一不是依赖外国的技术、设计、设备乃至产品。

5. 政治制度

还有一部分人分析中国崛起困难的方法是纯政治性的，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如果没有西方政治体制的支持就难以长期坚持下去。而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采取西方民主政治体制的可能性很小，所以经济改革将不断地受到现行政治体制的制约，经济体制不可能与国际经济体制完全接轨，这将使中国的经济发展受到严重的束缚。^② 经合组织专家认为中国经济改革的迅速发展不断要求中国进行新的体制改革，体制改革涉及医疗、住房、退休、教育等许多领域，这些改革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形成巨大挑战。还有人认为中国崛起将面临分离主义的威胁，解决民族分离主义问题的方法是接受西方的民主体制。然而中国采纳西方

参见 [美] 保罗·肯尼迪：《挑战世纪》第 159—160 页。

参见 [美] 保罗·肯尼迪：《挑战世纪》第 183 页。

政治制度的可能性不大，所以中国解决不了民族统一问题。不解决民族统一问题，中国崛起也将是困难的。中国悠久的灿烂文化、道德以及社会凝聚力一直令海内外的中国人引以自豪。但千年的专制统治，1840 年后的内乱外侮，包括 1957 年以后的种种政治狂热病都在国人的心灵上留下了深刻的伤痕。因此，尽管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但中国尚有待解决其国内的许多问题。

6. 军事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世界上人数最多的军队，中国拥有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依靠这支军队保家卫国当无问题，但要保卫海疆，援救侨民，统一祖国和境外作战就显得力不从心了。国外军事分析家基本认为中国的军队数量虽然是世界上最多的，但军事装备还很落后。只有个别的精英部队装备了较为先进的武器和设备，大多数部队的装备仅达到西方 60 年代末的水平。因此，中国现有的军事装备与发达国家比至少有 15—20 年的差距。一般讲来，军事技术的发展要领先现行军事装备 20 年，因此，如果比较军事技术方面差距，中国与发达国家则有 30 年的距离。1995 年 6 月的一篇题为《中国军队现代化在太平洋地区产生的影响》的报告认为，“按照人民解放军目前的现代化速度用比较现代化的装备更换 50 年代和 60 年代的装备将需要几年的时间。人们目前的看法是 中国在短期内不会大大提高它的投放能力。”

上述观点的共同点是对冷战后中国的国际地位持悲观态度，

参见《美助理国防部长约瑟夫·奈谈中美战略关系》，新华社华盛顿 1995 年 10 月 11 日电。

认为冷战后中国的国际地位不仅没有上升，反而下降了，已经不如冷战时期那么重要了。这类观点在冷战结束后的初期是西方有关舆论的主流。其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西方中心论”和“美国中心论”仍然是大多数西方政治家和学者的习惯思维。所谓冷战前后中国国际地位的变化，其判断的依据完全是以西方或美国为中心，以中国在美国和西方对外战略中的地位为依据，他们需要中国时，中国的国际地位就重要，他们不再需要时，中国的国际地位自然就要下降；其次，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对立在评估国家国际地位时仍然占有突出的地位。冷战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两大制度和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和较量，冷战胜利带来的狂欢及其对前景的预测使得许多政治家和学者认为社会主义的中国自身将面临崩溃，中国的国际地位也必将会日趋下滑。正是由于这两方面的依据都带有强烈的主观性和片面性，因此，有关中国国际地位下降的观点自身就存在着先天不足。1992年以后，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高，西方国家的政治家、学者和媒体期待中国重蹈苏联覆辙、出现政治制度动荡和更迭的幻想随之破灭，一种新的观点逐渐成为主流，这就是所谓的“中国威胁论”。

第二节 中国威胁论的产生和发展

“中国威胁论”是指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会导致军事实力的增强，从而对亚洲及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构成威胁的观点、理论和思潮。关于中国国际地位崛起对世界的影响，目前世界舆论的最大热点就是所谓的“中国威胁论”。中国威胁论的表现形式有多种多样，有经济威胁论、军事威胁论和文明威胁论等等。但其

共同点是：宣扬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必将导致包括军事实力在内的综合国力的增强，从而对亚太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构成威胁。^①

一、中国威胁论的产生和发展

冷战结束后，“中国威胁论”开始出现并且成为一种时尚，其影响十分广泛。宣扬、赞同与附和“中国威胁论”的人可谓比比皆是。这些人既有来自发达国家的，也有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既有声东击西、别有用心的政治家，也有不知内情、人云亦云的普通民众；既有故弄玄虚、耸人听闻的新闻记者，也有标新立异、各执己见的专家学者。“中国威胁论”自身也经历了一个产生和发展的过程。

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一些国外媒体和学者夸大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从而推理出中国的崛起已是事实，而这种崛起的直接后果必然是威胁邻国乃至整个世界。因此，“中国威胁论”得以逐渐盛行，并一度在美国、欧洲、日本甚至东南亚和亚太地区甚嚣尘上。

1990年8月，日本防卫大学副教授村井龙秀在《诸君》月刊上发表了题为《论中国这个潜在的威胁》的文章，从国力角度把中国视为一个潜在的敌人。因而被认为是“中国威胁论”的始作俑者，^②但在当时并未引起注意。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教授福瑞伯格从“权力转移”之观点出发，认为70年代末期中国即进

参见美国新闻记者和学者罗斯·芒罗的论著《正在觉醒的龙——在亚洲真正的威胁来自中国》[美]《政策研究》，1992年(秋季号)；以及罗斯·芒罗和理查德·伯恩斯坦合著的《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新华出版社1997年)是这一理论的代表作

参见葛暘：《浅析“中国威胁论”》，《亚太论坛》，1994年(4)，第1页。

入所谓“对外扩张结合内部工业化以及经济发展”之阶段，根据“权力转移”理论，一国国力发展包括：酝酿期、过渡期和成熟期，国家发展处于过渡时期时最具有威胁性，而中国目前正处于这种过渡期，所以中国崛起会具有最侵略性的征候。^①

自1992年以来，美国和西方国家的新闻媒体和专家学者，甚至某些政界领导人对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及其影响开始关注，由于分析方法和掌握资料的片面性，同时出于本国国家利益的考虑，开始对中国国力的上升表示担忧，并从各种角度、在各种场合提出并宣扬“中国威胁论”。欧美的一些新闻舆论表现尤为突出英国《经济学家》1992年出版的专刊《当中国醒来时》和美国传统基金会刊物《政策研究》1992年秋季号刊登的罗斯·芒罗（Ross H. Munro）的文章《觉醒的巨龙：亚洲的真正威胁来自中国》可算是开“中国威胁论”先河之“大作”。这两篇文章均认为中国将对亚洲以及美国的经济和安全利益构成威胁。其中，美国费城对外政策研究所亚洲计划协调员罗斯·芒罗在后来出版的《正在觉醒的龙——亚洲真正的危险来自中国》一书中指出：“无论在经济方面还是战略方面，中国将对我国的至关重要的利益构成越来越大的威胁。”^②自此，“中国威胁论”在国际舆论中开始赢得市场。1997年，他与理查德·伯恩斯坦（Richard Bernstein）合写了《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一书。该书宣称：中国在下世纪成为世界主导力量后，肯定是美国的长期敌人而不是战略伙伴，《即将到来的中美冲突》一书则可算是宣扬“中国威

参见向宠：《“中国威胁论”评析》，《国际政治研究》，1996年（2），第61页

参见[美]罗斯·芒罗：《正在觉醒的龙——在亚洲真正的危险来自中国》，[美]《政策研究》1992年（秋季号）

胁论”的巅峰之作。

这些媒体的思想很快在亚洲引起回应。1992年8月12日,日本《朝日新闻》认为:“中国正在成为破坏亚洲均势的不稳定因素。”^①而东南亚国家由于在历史、领土及意识形态上与中国存在着利益冲突,因而“中国威胁论”一度在东南亚也颇具市场。1995年10月,菲律宾总统拉莫斯在夏威夷东西方中心演说时曰称:“中国是东亚地区头号威胁。”^②菲律宾军事领导人还宣称:“中国像是南沙群岛的传染病,我们必须发展足够的抗体以预防它的传染。”^③印度等国出于自身的政治需要,对“中国威胁论”在亚洲地区的扩散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印度国防部长费尔南德斯在1998年印度连续进行五次核试验后声称:印度之所以进行核试验是为了应付来自中国的威胁。“中国是头号潜在的敌人”;中国构成的威胁比来自巴基斯坦的威胁还大。”^④“中国威胁论”在美日等西方国家政要的言论中也频频出现。克林顿上台不久,在就“建立亚太安全机制”问题致函东盟各国时,声称“中国已有取代前苏联在亚洲构成主要安全威胁的迹象。”1993年5月,日本前首相宫泽喜一在会见克林顿时表示“中国经济一经发展,就可能在军事上抱有野心。”^⑤

参见王少普:《论当今日本外交战略的基本目标》,《亚太论坛》,1993年(4),第24页。

^② 参见罗杰:《东南亚国家如何看中国威胁论》,《亚太参考》,1997.02.03,第2页。

参见[美]丹尼尔·伯斯坦,阿恩·德凯基泽:《巨龙》,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158页。

^④ 参见新加坡]《联合早报》,1998.05.06。

^⑤ 参见新加坡]《联合早报》,1998.05.06。

二、中国威胁论的表现形式

中国威胁论的主要论据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中国军事威胁论”。这一观点是基于这样一种逻辑，即中国经济发展以后，必然导致实力增长，而实力上增长必然会导致军事扩张，并且在对外关系中表现大国主义倾向；二是“中国经济威胁论”。这种观点的核心是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是世界上最快的，照这样发展，中国将成为“一条已经出洞而又不大飞回去的龙”，从而对世界经济构成威胁；三是“中国文明或意识形态威胁论”；四是“中国生态威胁论”五是“破坏现存国际秩序论”。

1. “中国军事威胁”

这是“中国威胁论”的着眼点所在，有些外国人认为中国的崛起不利于维护冷战后亚洲地区的安全和稳定。他们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必然使中国成为一个军事大国，对亚洲造成威胁，正如丹尼尔·伯斯坦和阿恩·德凯基泽在《巨龙》一书中分析的那样：“中国威胁论院外活动集团的前提是如果中国继续它的爆炸式的增长，而没有像苏联一样垮掉，逐渐变成民族主义的，会在美国变弱从西太平洋撤走时追求亚洲军事霸权”。^①“中国军事威胁论”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军费的高速增长导致军事力量过度发展。西方一些学者和媒体夸大了中国军费的规模和水平，声称中国正在用一种危险的方式使用财富，这就是用于大规模的军事集结。^②中国的军费增长速度太快，军费增加意味着中国将可能使用武力手段解决国际争端。1993年冬季号《华盛顿季刊》中《东亚新的安全问

参见[美]丹尼尔·伯斯坦，阿恩·德凯基泽：《巨龙》第67页。

^② 参见葛晓：《浅析“中国威胁论”》，《亚太论坛》，1994年（4），第2页。